

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

柴志明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 明朝以朱注《四书》为科考内容, 必然扭曲文人的心态: 轻者因皓首穷经而变得思维狭窄、陈腐, 重者吹牛拍马、“夤缘阿附”, 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 丑态百出, 人格丧尽。有独立思想的文人起而反思、质疑, 走出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 或沉迷学术, 或放任自流, 以激进的方式回应科举的得失与成败。

[关键词] 科举文化; 明代; 文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 D691.3; I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3-0149-05

科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 隋朝时已开始萌芽, 唐朝才正式确立, 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由于这种制度引入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机制, 使有些出身贫寒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成为现实,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整个士人阶层把中举作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追求, 把读书作为追求功名的惟一方式。许多读书人一生经营于此, 皓首穷经, 唐朝诗人赵嘏的“太宗皇帝真长策, 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诗句就是对此的最形象的说明。历经宋、元四百余年的发展之后, 明代的科举制度更为完善, 对知识分子的笼络和钳制手段更为多样。朱元璋在洪武三年的诏书中说: “汉唐及宋, 取士各有定制, 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 而权豪势要, 每纳奔竞之人, 夤缘阿附, 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 耻与并进, 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 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 特设科举, 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1](p.695)然而, 他以及他的继承者只把四书和朱子的注疏作为科考的惟一范围, 而且谨依此一范围而不能有任何发挥和创造, 对人才德艺的衡量仅凭一篇死板无用的八股制艺, 势必让才情平庸者, 靠吹牛拍马、“夤缘阿附”者, 采取卑鄙手段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往往成为科场之中的常胜将军。而有才学之士只想凭自己的能力取得社会的认可, 这就决定了他们科举之路的崎岖艰难。很多学子呕心沥血, 却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科举成为这些读书人的严重心病。

一、认同与归依: 文人思维的狭窄化、价值的世俗化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1414)敕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 颁行天下。明成祖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序言中说: “由是穷理以明道, 立诚以达本, 修之于身, 行之于家, 用之于国, 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 国不异俗, 大回淳古之风, 以绍先王之统, 以成熙雍之治, 将必有赖于斯焉。”^[2](p.11)他大兴科举, 施行文教, “龙飞初科, 取士倍蓰于前, 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首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 摩励天下, 而为此盛举耳。”^[3](p.260)身受此项举措恩泽的士人无不感恩戴德, 胡广便说: “陛下待儒

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矣。〔4〕杨士奇说:“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5〕(p.10)所以,这些中举的文人尽管心态不一,但都一致地把自己的人生道路归依在皇权思想的旗帜之下。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作臣子的尽拣一些好听的话说,写文章也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宣德年间进士李贤在序杨溥文集时说:“观其所为文章,辞惟达意而不以富丽为工,意惟主理而不以新奇为尚,言必有补于世而不为无用之赘言,论必有合于道而不为无定之荒论,有温柔敦厚之旨趣,有严重老成之规模,真所谓台阁之气象也。”〔6〕(p.17)

从内容上讲,为道与用;从风格上讲,为温柔敦厚。李贤对杨溥的概括是准确的。其后的四库馆臣又说:“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泠泠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为其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7〕(p.1)

文人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文人的心态,文人的心态又影响了文学风格的形成。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诗人陈陈相因,所创作的诗歌极度平庸乏味,一直左右文坛达百年之久,以至在成化年间居然出现了“时文为南曲”^①的创作风气。丘濬的《五伦全备记》已纯是封建伦理的诠释,把人们的思维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除了代圣贤立言之外,不能有任何思想的存在。其时的拟古派文学思潮大致走的也是这条路子。

思想上的狭隘和浅陋,势必造成对利益的世俗追逐行为。由于利益的驱动,他们的行为可以脱离圣贤教诲的轨道,童生要考秀才,秀才要考举人,举人要考进士,进士的目的是中状元,科举只是成为他们谋取利益的惟一手段。顾炎武描述当时的情况时说:“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8〕(p.1030)而且:“士人非科第无以自见,故始为诸生,欣羨一举,不啻起渊希冀显荣。一命以上,寸计尺积,岁无宁日,日无宁时。既位列公卿,犹思恩逮上世,赏延后裔。盖终其身未尝忘进取,何能定静安舒?所谓诵法圣贤者,取陈言应制科尔,甫服冠裳,辄尽弃去。悲夫!以是立功名且不可,何论道德!”〔9〕(p.70)对利益的追逐导致道德伦理的沦丧:“今人不喜人言,见人张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词,则目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圆巧而委曲,则以为善处。是以转相则效,翕然风靡。为士者口无公是非,后继承讹踵弊,不复知有言之实矣。”〔10〕(p.348)上下相因,乌烟瘴气。王阳明对因科举带来的这些不良现象深为不安。他说:“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名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11〕(p.224)见利而忘义,士风至此,可见科举为害程度之深。

二、科举文化变奏之一:从质疑到反叛

由于科举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致使有些中举者既无才又无德,而真正学富五车的有志之士,只能抱恨终身。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坑,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12〕(p.1260)顾氏之言并不是危言耸听。

文徵明在其诗文中先后撰写了《戴先生传》、《顾春潜先生传》、《杜允胜墓志铭》、《王履吉墓志铭》、《东川军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铭》等科举失意的士人传铭。这些士人曾经耗费一生的精力从各个方面探索科举成功的方式,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讲到戴冠先生时称:“其学自经、史外,若诸子百家,山经地志,阴阳历律,与夫稗官小说莫不贯总。而搜弥剜剔,必求缘起而会之以理,为文必以古文为师,汪洋澄湛,奋迅凌轹,而议论高远,务出人意。诗尤清丽,多寓讽刺。推其余为程文,亦奇隽

① 徐渭《南词叙录》:“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

不为关键束缚。一时誉起籍籍起诸生间。〔13〕〔p.210〕然而，如此饱学之士却“八试皆绌”，难怪文先生感慨万千：“以余观于戴先生，一第之资岂其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顿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谓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谓能尽天下之士，谁则信之？”〔13〕〔p.211〕原因何在？归有光从自身的经历中找到了答案。他说：“世事殊不可测，劝君行固难，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顷刻能就，只是时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见短，不然终岁俯首占毕何为者？不须问江东神，鄙人便是也。”〔14〕〔p.540〕从自身数十年的科场经历得出结论——科举毫无定准可言，惟一的标准便是中与不中，所谓“时之论文，率以遇不遇家铎两焉”〔15〕〔p.33〕。可悲的是，这些人“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16〕〔p.97〕。归有光叹息说：“国家以科举之文取士，士以科举之文升于朝，其为人之贤与不肖，及其才与不才，皆不系于此。至于得失之数，虽科举之文，亦不系其工与拙。则司是者，岂非命也夫？”〔17〕〔p.333〕把自己的落选归之于命，固然不可取，但所言科举有失公平的观点，还是一针见血的。

真正举起反叛科举之旗的应是标举王阳明心学的清操之士。他们坚持自我的人生理想，以弘扬圣学为己任，视科举为俗学，羞与那些“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辈为伍。薛瑄直接把科举与理学对立起来，认为：“道之不明，科举之害也”〔18〕〔p.328〕，平生讲学不愿入仕；吴与弼读朱子《伊洛渊源录》后，立志学为圣人，“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19〕〔p.587〕。他果然不再参加科举，以躬耕讲学终其一生。他们的举动引起朝臣和皇帝的愤怒和拒斥，嘉靖十一年，夏言向世宗上了《请变文体以正士习等事疏》。疏文指出：“刻意以为高者，则浮诞恢诡而不协于中；骋词以为辨者，则支离磔裂而不根于理，文体大坏，比昔尤甚。”〔20〕〔p.305〕“文体大坏”指的是王阳明的良知之说^①。更有敢与圣学唱反调者。据沈德符记载，有著述“专攻周、程、张、朱，献之朝”的朱友季，有“删改《四书》、《朱子集注》进呈”皇上的无锡处士陈公懋等〔21〕〔p.633〕。李贽一生的主要兴趣在于自我生命的自由和解脱，故而参禅论道，与传统的封建文化势如水火，时人目他为异端，他自己也坦然承担起来，在客观上已引领着一代的时代潮流。

这些文人不囿于传统，对束缚人性的程朱理学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已经成为传播程朱理学的工具，与日益变化的社会和人们的思想格格不入，惟有矫正，才不致深陷泥坑不可救拔。这样，寻找生命的真谛自然成为他们探寻的课题。

三、科举文化变奏之二 适世、娱世的人生追求

中晚明文人大多注重人性的揭示，有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求乐、求真成为他们一致的美学追求。袁宏道在《龚惟长先生》一信中说人生有五种“真乐”，理想的生活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谈”〔22〕〔p.205〕。王世贞《答周俎》云：“仆于诗，质本不近，而意甚笃好之，然聊以自愉快而已。”〔23〕〔p.153〕江盈科把对诗文的嗜好比作下棋，吟诵“破闷编《谐史》，嘲时托醉歌”的诗句，在冗长繁杂的事务间自得其乐，袁中郎“钟于山水花竹”，而以“栽花莳竹”自娱心志〔24〕；俞婉纶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自娱集》，闻启祥的文集则曰《自娱斋稿》，蒋如奇、李鼎选《明文致》自称是“案头自娱”之物，郑元勋辑小品专集《媚幽阁文娱》，更明确宣扬文学的愉悦作用，他在序中说：“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皆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则天地产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悦人者，则何益而

① 王阳明不满意朱熹体认天理的方法，提出“心即理”说，把朱熹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范畴“理”本体改造成与感性血肉相连的“心”本体，这就使原本只是“具有如法规似的普遍性”的“道德行为”渗透了有主体意识的感性内容，从而使朱熹建构起来的所谓“理一殊”的“理世界”趋于“瓦解”。

并育之?以为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悦则生亦槁。故两者衡立而不能偏绌。〔26〕由此,“谐谑”也成为文人抒发性灵的一个部分,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感受。他们不但喜欢听,喜欢讲,而且对其特点善于归纳。如徐渭在《东方朔窃桃园赞》中说:“道在戏谑。”谢肇淛说:“古今载籍,有可以资解颐者多矣,苟悟其义,皆禅机也。〔26〕p.322”这已经把戏谑的作用提到可以禅悟的高度。一时谐谑的书籍充满街头巷尾,成为文化史上一大景观,如:潘坝《楮江室》,耿定向《权子》,李贽《山中一夕话》,陆灼《艾子后语》,姚旅《露书》,刘元卿《应谐录》,徐渭《谐史》,谢肇淛《五杂俎》,郭子章《谐语》,浮白斋主人《雅谐》,浮白主人《笑林》,张夷令《迂仙别记》,郎瑛《七修类编》,江盈科《谈言》、《雪涛小说》、《雪涛谐史》,郁履行《谐浪》,钟惺《谐丛》,赵南星《笑赞》,潘游龙《笑禅录》,醉月子《精选雅笑》,陈眉公《时兴笑话》,乐天大笑生《解悃编》,吴国安《累瓦编》,此外还有无名氏的《谐藪》、《笑林》、《解颐赘语》、《胡卢编》、《喷饭录》、《笑海千金》、《时尚笑谈》、《华筵乐谈笑酒令》等〔27〕。

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中,文人对科举之心的淡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畿开始立志科举,接触了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后,诚心拜在王门。据载:“(王畿)及觅大舟,聚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无别谈;自《六经》、《四书》、《传习录》外,手无别检。间有及时艺者,曰:‘业已忘之矣’;有及试事者,曰:‘业已任之矣。’及抵都,欧阳南野宗伯(欧阳德)、魏水洲谏议(魏良弼)、王瑶湖宪伯(王臣)泊郡邑入謁诸同志,争迎公,与相辩证,由是公名盛一时。〔28〕”醉心学术而弃科举,只是他人生选择中的另一重要途径,绝大多数的晚明文人在科举这一条路上踉跄挫折之后,反思自己的行为,重新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走向。唐寅、袁宏道的曲折的心路颇能说明问题。

唐寅在弘治十一年举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对他极其器重,把他的奇文拿给当时的朝臣程敏政看,希望引起他的注意。然而,没过多久,“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滴为吏”。唐寅认为是对自己极大的耻辱,从此厌恶科举为官,“归家益放浪……筑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往往出名教外”〔29〕p.7352。

袁宏道“十六为诸生……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29〕p.7398。特别是自万历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间三次访晤李贽之后,“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浸浸乎其未有涯也”〔30〕p.183。其时,公安派健将之一的江盈科也在苏州做知县。他和袁宏道都有厌世退隐之心,诗酒唱和,交往频繁,不但成为挚友,也是志趣一致的同调。于是,他们在创作和理论上开始新的探索,性灵派由此形成。

其实,这些文人骨子里全是儒家意识,没有一个不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之志。唐寅几次科举,希望荣登仕途,李贽任姚安太守之时,博得过“政令清简”的美誉〔31〕p.533;袁宏道知县一任,政绩显赫,冯梦龙在寿宁四年,“政简刑清”,民风淳朴等。他们之所以视科举为荼毒、官场为畏途而另觅闲适自在的生活之道,是因为官方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倡导和努力背道而驰。在强大而顽固的传统势力面前,他们感觉渺小、无助,因此,洁身自好和狂妄自傲,成为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最后选择。然而,他们的选择在客观上对晚明社会又是一次大胆的针砭,加上王学左派的冲击,晚明思想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各种知识、思想和信仰都在这个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相当自由的空间”〔32〕p.323。形而下的市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都是表达回归人性的强烈愿望。

[参 考 文 献]

[1] 张廷玉. 明史·卷七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转引)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3] 吴宽.吴县儒学进士题名记[A].吴宽.家藏集.卷三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4] 明太祖实录.卷五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5] 杨士奇.东里文集.朴斋记.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6] 徐郁.明名臣琬琰录后集:卷一[A].(转引)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7] 杨文敏.杨文敏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8] 顾炎武.名教[A].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
- [9] 张瀚.士人纪[A].张瀚.松窗梦语.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0] 李梦阳.空同集.卷三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11] 王阳明.书林司训卷[A].王阳明.王文成全书.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12]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
- [13] 文徵明.戴先生传[A].文徵明.甫田集.卷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14] 归有光.与沈敬甫[A].归有光.震川别集.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15] 归有光.会文序[A].归有光.震川集.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16] 归有光.山舍示学者[A].归有光.震川别集.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17] 归有光.南云翁生圻志[A].归有光.震川别集.卷二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18] 薛瑄.敬轩文集.卷一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19] 吴与弼.跋伊洛渊源录[A].吴与弼.康斋文集.卷一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20] 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一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 [2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2]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3] 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
- [24] 袁宏道.瓶史序[A].李保民.明清娱情小品撷珍[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5] 吴公调.晚明文人的“自娱”心态与其时代折光[J].社会科学战线,1991(2).
- [26] 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27] 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28] 徐阶.龙溪王先生传[A].王龙溪.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29] 张廷玉.明史.卷二八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0] 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A].唐昌太(选注).三袁文选[M].四川:巴蜀书社,1988.
- [31] 刘侗.帝京景物略.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3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On Ming Candidates/Schol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CHAI Zhi-ming

(Zhejiang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 Hangzhou 310015 , China)

Abstract : The contents for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 which were based on The Four Books (The Great Learning ,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and Mencius) annotated by Zhu Xi (a renowned scholar of the Song Dynasty) , distorted the mentality of Ming candidates or scholars . One outcome of studying the Four Books through their lifetime was that the candidates became narrow-minded

and pedantic. Another was the loss of their dignity and individuality in a frenzy of passing such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examinations had remained a constant source of worry for Ming candidates. In describing the situation, Gu Yanwu, a Ming scholar, said that abundant food and a gold house were all that the adults used to stimulate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After these children grew up, they began to go after what they had been told about in childhood. The emperors and ministers were all guided by the interests, too. Such became a mainstream that could no longer be held back. On the moral corruption resulting from seeking the interests, he further remarked that the people of today preferred greetings with clasped hands to those with words, for the silent were regarded as steady; frankness was no longer a merit, and in its place is slickness, which was now an equivalence of tact. This was so prevailing that the established officials never commented on truths of state affairs and, as a result, their successors followed suit. Therefore no one could be certain of what others really meant by what they said.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d fallen into an abyss of disorder. However, real thinkers began to question the society and take a different path. Noble-minded scholars such as Wang Yangming stuck to their thoughts and despi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ile keeping away from those who were "empty and outdated, vain and vulgar" and pursuing their freedom of life. These scholars became spokesmen for and pioneers of human individuality in the Ming Dynasty. They stayed away from the worldly distractions and preoccupations, finding their own pleasure in their little world of amusement by amusing the world around them. Seemingly hermits, they had all been ambitiou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fucian teachings, to "run the country well and give people peace and security". The Ming artist Tang Yin, for example, tri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everal times for an official career; Li Zhi, philosopher and writer, led an honest and simple life as prefect in Yao An; the writer Yuan Hongdao attained marked achievements in governing a county; and Feng Menglong, a pioneer novelist, enjoyed the high remarks "clarity and efficiency i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on" during his four-year governorship in Shou Ning where people were known for being simple and honest. These scholar-officials quit their official career just because the dominant ideology ran counter to and overshadowed their ideas and ideals. Owing to their failure to reject the strong and deep-rooted tradition of the time, they felt so insignificant and helpless as to retire into their own world of spiritual purity and defiant pride.

Key words: culture of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Ming Dynasty; the mentality of Ming candidates/scholars

本刊讯 2004年3月18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正式成立。浙江省司法厅厅长胡虎林、副厅长吴强军、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杨泉森、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副校长黄书孟、胡建森、来茂德以及来自省市的公、检、法和医疗单位的来宾出席了会议。黄书孟副校长宣读了司法部和浙江大学的文件,张浚生书记和胡虎林厅长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揭牌。张浚生书记、胡虎林厅长、杨泉森副厅长、孙东东教授、来茂德副校长在会上作了讲话。司法鉴定中心将依托浙江大学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和学科综合优势开展工作,中心的成立,在促进学科发展的同时,也要切实全面加强司法鉴定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在保障司法鉴定优质高效上下工夫,要以公正取信于民,树立良好的司法鉴定形象,为我国司法法制建设作出积极贡献。